

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

陈天社

内容提要 埃及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埃及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埃及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此后该问题一直是埃及对阿拉伯政策的重要方面。埃及的积极推动,为巴、以和谈僵局的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方面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埃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埃及 巴勒斯坦 巴以和谈

巴勒斯坦问题是20世纪以来最为人们所关注的民族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不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间的问题,还与国际社会密切相关。由于英国、美国、苏联等大国的插足,使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化,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埃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为学术界所忽视。本文试就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予以探讨。

一、埃及与巴勒斯坦的历史关系

巴勒斯坦与埃及在地理上相接,是埃及通往东方的必经之地,埃、巴双方在古时候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巴勒斯坦曾几度成为在埃及兴起的封建王朝图伦王朝(公元869—905年)、伊赫什德王朝(公元935—969年)、法蒂玛王朝(公元909—1171年)、艾尤布王朝(公元1171—1250年)、马木鲁克王朝(公元1250—1517年)的辖区。这些王朝中直至今日仍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称道的是艾尤布王朝的创立者萨拉丁和马木鲁克王朝的第四任苏丹拜伯尔斯。公元1096—1291年,西欧封建主利用阿拉伯帝国衰落之机,打着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旗号,对地中海东岸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张运动(史称十字军东侵),巴勒斯坦被践踏在十字军的铁骑之下。萨拉丁和拜伯尔斯均曾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率众抵抗过十字军,前者收复了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收复了圣城耶路撒冷,被誉为民族英雄;后者战胜了十字军,铲除了十字军在巴勒斯坦除阿克外的全部据点(该地公元1291年被穆斯林收复),使巴勒斯坦从此回归到穆斯林手中。19世纪初,在埃及兴起了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统辖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公元1805—1849年),其在向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扩张中再次征服了巴勒斯坦,但后因在第二次土埃战争(1839—1841年)中失败而撤离该地。

埃及对当今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20—30年代。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扩张,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的矛盾日益激化,引起了埃及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高度关

注。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起义时,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和阿拉伯主义组织积极动员公众支持巴勒斯坦人,1936年建立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 (Hasan al-Banna)、华夫脱党前副主席哈米尔·巴萨尔 (Hamil al-Basal)在内的救济巴勒斯坦烈士高级委员会。而埃及当时在任的纳哈斯政府也开始注意巴勒斯坦的局势,称“政府对兄弟的阿拉伯人非常关注,准备保卫他们的权利和安全”。¹ 1938年,埃及内阁中成立了巴勒斯坦委员会,并派代表参加了1939年在英国举行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1938年10月15日,埃及东方妇女组织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强调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是为生存和作为一个整体的阿拉伯民族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同日,埃及议会一委员会讨论并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停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维护巴勒斯坦的统一和完整性,建立巴勒斯坦自己的民族自治政府。^④ 为应对巴勒斯坦严峻的形势及寻找阿拉伯统一的途径,在埃及的积极协调下,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于1944年9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聚会,讨论成立阿拉伯联盟问题。巴勒斯坦人穆萨·阿拉米 (Musa al-Alami)作为巴勒斯坦代表参加会议。埃及还对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进行了批评,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反对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1948年5月15日,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兵巴勒斯坦以阻止分治决议的实施,但遭到失败。巴勒斯坦战争后,埃及一直管理着加沙地带,直至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为对抗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埃及帮助哈吉·阿明·侯赛尼 (Haj Amin al-Husseini)于1948年10月在加沙建立了巴勒斯坦临时政府。侯赛尼政府对阿拉伯国家非常失望,在20世纪50年代初向以色列发动了游击战,这导致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加剧,成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序幕。侯赛尼政府于1956年迁到开罗,1959年又迁至贝鲁特,后被巴解组织取代。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失败后,由阿拉法特等建立并领导的开罗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是惟一被阿拉伯国家允许存在的巴勒斯坦人组织。

纳赛尔时期,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埃及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的重要方面。纳赛尔亲身参加过巴勒斯坦战争,执政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便实现他恢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承诺。1954年建立了开罗巴勒斯坦电台,到1960年时每天早上广播2小时,下午广播半小时。为有效统一巴勒斯坦各派别,在纳赛尔的努力下,1964年1月召开了首次阿拉伯首脑会议,阿赫马德·舒克里 (Ahmad Sheqeiri)为巴勒斯坦代表,这是巴勒斯坦人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出现在阿拉伯国家面前,并决定建立巴解组织 (由舒克里领导)和巴勒斯坦解放军,但实际上巴解组织被埃及所控制。1967年“六·五”战争后,埃及决定不支持舒克里,开始与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接触。1968年,埃及允许法塔赫在开罗建立电台。次年,在埃及的支持下,法塔赫加入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当选为该组织主席直至去世。纳赛尔支持阿拉法特,是想利用他来与以色列对抗。在埃及的支持下,巴解组织向以色列发动了无数次袭击。纳赛尔还致力于协调巴解组织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如调解巴解组织与黎巴嫩政府的关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调停1970年约旦与巴解组织的武装冲突。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与参与,除了出于阿拉伯民族兄弟情谊之外,还有利用它来为埃及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一面。

二、埃及和平与巴勒斯坦问题

“六·五”战争失败后,埃及接受了联合国242号决议,后又接受了美国提出的罗杰斯计

¹ J. P. Shama *The Arab Mind: A Study of Egypt, Arab Unity and the World*, H. K.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1990, p. 44.

^④ 参见 J. P. Shama *The Arab Mind: A Study of Egypt, Arab Unity and the World*, p. 44.

划。这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反对,巴解组织称埃及接受联合国 242号决议是对巴勒斯坦人的背叛,因为该决议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民族,而是把巴勒斯坦人问题作为难民问题来对待。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谴责埃及接受罗杰斯计划,称武装斗争是巴勒斯坦惟一的解放之路。开罗的巴勒斯坦电台也攻击纳赛尔,后被停办。1970年萨达特执政后,调整了埃及的内外政策,逐渐把关注点放在埃及自身,走上了与以色列实现和解的道路。1978年9月,埃、以在美国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署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条约的纲要》的总称)。1979年3月,两国又在美国签署了和平条约,实现了和平。埃、以单独媾和,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阿拉伯国家指责埃及背叛了阿拉伯人的利益,特别是背叛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认为埃以和平是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

客观地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和谈虽是谋求埃及的一己私利,但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埃及试图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埃及总统萨达特早在1977年11月访问以色列时就强调,他不是为埃及一国的单独和平而来,而是为全面、永久、公正的和平而来。他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土地,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他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称:“没有人能够否认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阿以)问题的核心,没有人能接受你们以色列人所宣传的巴勒斯坦人不存在或应安置在其他地方的观点。巴勒斯坦人及其合法权利不容否认,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事实”;“没有巴勒斯坦人,就没有和平可言。你们将贝尔福宣言¹作为你们立国的基础,但如果你们发现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在本不属于你们的土地上,你们就有义务理解巴勒斯坦人为重新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我告诉你们,不承认巴勒斯坦人、不承认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④陪同访问的埃及代理外长加利也表达了埃及对巴勒斯坦人的感情。他对以色列外长摩西·达扬说:“每当我们看到一名巴勒斯坦兄弟在自己的国家被占领的沉重压力下生活,或被投入到监狱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像巴勒斯坦人一样被剥夺了权利,并能体会到他们失去祖国的愤怒与苦涩;阿拉伯世界应该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阿拉伯人仍能感受到当年‘痛失西班牙’^(四)的情感,失去巴勒斯坦是外部强国强加于阿拉伯世界的殖民主义。”^½此后,萨达特多次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直到1981年8月他最后一次访问美国时仍强调:“以色列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巴勒斯坦问题不是242号决议中所说的人道主义问题,巴勒斯坦人应当有自己的祖国,而巴勒斯坦人则必须承认以色列在其边界之内的存在。”^½

1978年9月埃及和以色列在戴维营谈判时,巴勒斯坦问题是双方分歧的焦点之一。萨达特坚持把巴勒斯坦问题与埃以和平联系起来,而以色列坚决反对。正是由于萨达特的坚持,《戴维营协议》才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谈判做出详细规定:由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巴勒

¹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于1917年11月2日致信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银行家洛希尔,声称英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一信件后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它被看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发展及以色列建国的国际法基础。

^④ Joseph P. Lorenz, *Egypt and Arab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Westview Press, 1990, pp. 140-141.

^(四) 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了西班牙,西班牙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1609年,西班牙人将穆斯林全部驱逐出西班牙,西班牙重新回归基督教世界。

^½ [埃]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著、张晓译:《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一位外交家为争取中东和平不懈努力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½ 新华社1981年8月9日电。

斯坦人的代表分三阶段对巴勒斯坦的自治、五年过渡期及最终地位予以谈判解决。¹ 在埃、以缔结和约的谈判中,萨达特再次力争把签订埃以和约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在埃以和约的序言中明确写道:“《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的目的是要构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的基础,而且是以色列和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同它谈判和平的它的其他各个阿拉伯邻国之间实现和平的基础,缔结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是谋求这个地区全面和平和谋求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一切方面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步骤。”^④在作为和约附件的埃及、美国、以色列三国首脑之间有关埃以和约一些问题的信件中,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向美国总统卡特表示,埃、以同意在交换和约批准书后一个月内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举行为期一年的谈判。^(四)从1979年5月起,埃及和以色列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举行了十几轮谈判。以色列宣称,给予居住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以有限自治是它准备做出的最大让步,以色列将拥有这些土地的主权,耶路撒冷问题不容谈判,不承认巴解组织,更不同它接触和谈判,否认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将继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而埃及认为,自治是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主权和独立提供条件,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终在1967年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埃及要求停止和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认为以色列必须承认巴解组织并同它谈判。埃及官员多次重申,只要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愿望没有实现,该地区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埃及还认为,从长远来看,除了与巴解组织谈判以外,以色列别无选择。埃及承认耶路撒冷问题的敏感性,认为“它既承载着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情感,但同样事关2亿阿拉伯人和全世界10亿穆斯林”,^{1/4}并建议暂时搁置这一问题,认为“如果问题没有恶化,应给予时间,在50年里找到解决方案。也许,到那时沙特或约旦的旗帜将飘扬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上方”。^{1/2}但此建议遭到以色列的拒绝。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埃及中止了谈判。

与埃及的愿望相反,埃、以之间的和平并没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首先,埃及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立场各异,无法达成一致。与埃及一国单独实现和平(以色列试图一对一解决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而阿拉伯国家长期强调在与以色列斗争中的整体性),是以色列的既定政策,它根本就不愿意让巴勒斯坦人享有其合法的民族权利。以色列还将与埃及的和平当做分化阿拉伯阵营、为其在占领区的行动提供更大自由度的手段。而埃及坚持谋求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的进展,以摆脱阿拉伯世界对其“背叛巴勒斯坦人利益”的指责,也将解决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看成是埃及这个阿拉伯“大兄长”对巴勒斯坦这个阿拉伯“小兄弟”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巴解组织和约旦对《戴维营协议》的抵制。萨达特原以为,随着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实现了和平,其他阿拉伯国家将效仿埃及的行动,加入到和平进程中来。但出乎他预料的是,他原以为肯定会支持他的巴解组织和约旦却对《戴维营协议》采取了反对的立场。在《戴维营协议》签署的次日,巴解组织就召开会议讨论该协议,认为萨达特没有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利益,呼吁巴勒斯坦人民举行总罢工,“坚决抵制戴维营阴谋”。^{1/4}约旦和巴解组织的反对,使《戴

¹ 参见〔以〕摩西·达扬著、张存节译:《沙漠中的和平——达扬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47—450页。

^④ 转引自〔以〕摩西·达扬著、张存节译:《沙漠中的和平——达扬回忆录》,第462页。

^(四) 参见〔以〕摩西·达扬著、张存节译:《沙漠中的和平——达扬回忆录》,第493页。

^{1/4} Ephraim Doweik, *Israeli-Egyptian Relations 1980-2000*,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LTD., 2001, p. 229

^{1/2} 同上。

^{1/4} 赵克仁:《美国与中东和平进程研究(1967—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3年,第65页。

《戴维营协议》原来所设计的巴勒斯坦谈判方案无法执行。萨达特曾想以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本地的巴勒斯坦人代表取代巴解组织来参加巴勒斯坦自治谈判,但未果。萨达特邀请了 40 名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与他会晤,协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当中只有一半人接受了邀请,到会的仅有 12 人。¹ 随着埃及和巴解组织关系的恶化,萨达特嘲笑巴勒斯坦领导人是缺乏智慧与远见的蠢才,决定在《戴维营协议》设计的和谈进程中临时代表巴勒斯坦人。但没有巴勒斯坦人的参加,要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不可想像的。正如以色列外长达扬所言:“如果没有侯赛因国王或者约旦政府的代表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同他(萨达特——笔者注)一道进行谈判,他就不能取得和平。”^④

第三,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放弃。在埃以和谈中,美国充当了双方谈判的正式伙伴。如果没有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将难以达成协议。根据埃及、美国、以色列三国领导人就埃以和约问题的信件,美国仍是巴勒斯坦问题谈判中的正式伙伴。但鉴于埃、以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已经危及到埃以和谈本身能否取得突破,美国总统卡特改变了原先支持埃及将巴勒斯坦问题与埃以和约挂钩的立场。在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谈判时,卡特已将重心放在自己的竞选连任上,因而对该问题的谈判重视不够。后因卡特竞选连任失败,取而代之的里根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全力以赴,使美国没有起到如戴维营谈判时那样的正式伙伴的作用。这样,由于缺乏外部推动力,在这一问题上本来就分歧严重的埃及和以色列丧失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埃、以实现和平后,埃及与巴解组织断交,埃巴关系降到谷底。埃及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是自己的骨肉同胞,为了他们将同以色列战斗到最后一个埃及人;但又认为巴解组织是腐败的,它脱离了巴勒斯坦大众,其领导人生活在由阿拉伯民族为其支付费用的高级宾馆里,而巴勒斯坦人却生活在难民营。埃及还指控巴解组织领导人以百万计的资金来从事恐怖、勒索及敲诈活动。而巴勒斯坦人对埃及不允许其获得在埃及的永久居留权不满,对埃及干预巴勒斯坦事务颇有非议,指责萨达特为达成埃以和约出卖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埃及与巴解组织断交,但双方的高层往来从未间断,巴解组织还在开罗设有大使级机构。1981 年穆巴拉克上任后,双方关系迅速得到改善。

三、埃及与巴以和谈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仍在为谋求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而努力。穆巴拉克总统改变了萨达特时期代替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谈判的做法,开始在巴、以间充当调解人,促使双方直接谈判。早在 1982 年 4 月,穆巴拉克就指出:“和平是通往将来道路和本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保证。埃及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或者代表他们讲话,但埃及将始终不渝地进行有关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巴勒斯坦自治的谈判。”^④ 后来,虽然埃、以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谈判无果而终,但埃及一直在关注着巴勒斯坦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埃、以“冷和平”形成后,穆巴拉克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条件之一就是改善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状况。在埃及的斡旋下,1985 年巴解组织与约旦达成了联邦方案。随着埃及“回归”阿拉伯世界步伐的加快,惟一与以色列

¹ 参见 Ephraim Doweck, *Israeli-Egyptian Relations 1980-2000*, p. 231.

^④ 路透社芝加哥 1978 年 2 月 13 日电。

^④ 钟冬编:《中东问题 80 年》,新华出版社,1984 年,第 233 页。

有官方关系的埃及在巴、以间的作用突显。1989年2月,阿拉法特明确指出,巴解组织愿在国际会议范围内与以色列举行直接或间接谈判,要求埃及居间斡旋,以实现巴、以高级会谈。在1989年埃及正式重返阿盟后,穆巴拉克决心在促成巴、以对话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年6月,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加利访问以色列时正式表示,埃及愿充当巴、以间的调解人。同年8月,穆巴拉克在访美时提出了《关于在以色列占领区举行选举的十点和平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必须撤出选举区;以色列保证接受选举结果;选举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停止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居住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选区的巴勒斯坦居民必须参加选举。¹阿拉法特在和穆巴拉克会谈后接受了埃及的建议。以色列工党原则上同意了埃及的建议,派该党领导成员、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宾赴开罗与埃及总统会谈,双方达成巴、以必须对话的共识。但是,由于利库德集团的坚决反对,埃及的计划被以色列政府拒绝。

1993年后,巴以和谈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双方相继签署了《关于在加沙—杰里科首先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1993年9月)、《开罗协议》(1994年5月)、《塔巴协议》(1995年9月)、《希伯伦协议》(1997年1月)、《怀伊协议》(1998年10月)、《沙姆沙伊赫备忘录》(1999年9月)。巴以和谈取得成果,首先当然是由于巴、以双方的诚意与努力,此外,国际社会特别是埃及的斡旋亦功不可没。在奥斯陆秘密谈判期间,埃及安排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解组织高级官员阿布·马赞(即马哈茂德·阿巴斯,曾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首任总理,现任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布·阿拉(即现任总理艾哈迈德·库赖)在埃及空军的一架飞机上举行秘密会晤。这次会晤使双方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使佩雷斯下定决心直接与巴解组织打交道,巴解组织方面也认识到必须修改本方所设想的多个区域一起实行自治的“斑豹计划”。在1993年初以色列提出《关于在加沙—杰里科首先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草案后,穆巴拉克立即分别与佩雷斯、阿拉法特会晤。在弄清以色列的底数后,他否决了阿拉法特在加沙—杰里科之间建立一条“走廊”的要求,建议先接受该协议。在穆巴拉克的极力劝说下,阿拉法特接受了以方的计划。此后,埃及的开罗、塔巴、沙姆沙伊赫成为巴、以讨价还价的主要场所。巴、以双方重大分歧的解决,离不开埃及领导人的智慧。在埃及主持下,巴、以在埃及举行了十多轮落实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开罗协议》。在该协议谈判的最后关头,是穆巴拉克的两次介入才使谈判起死回生。穆巴拉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若达不成协议,谁也别想离开埃及。在1994年5月4日的签字仪式上,拉宾和阿拉法特因附件问题发生争执,协议眼看就要告吹。穆巴拉克和其他出席签字仪式的领导人赶快退回幕后对两人进行劝说,这才使协议得以签署。巴、以关于巴勒斯坦大选问题的谈判,也是在埃及举行并达成一致的。1995年9月,在埃及等国的积极斡旋下,巴、以又达成扩大巴勒斯坦自治的《塔巴协议》。巴以和平进程再向前迈进了一步。1996年,一直声称反对巴、以签署和平协议的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上台执政,巴、以会谈屡屡受挫。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继续向前,穆巴拉克召集阿拉伯首脑聚会于开罗,提出7点旨在实现全面、公正和平的主张,强调必须恢复和继续和谈,和谈必须遵循马德里的会确定的基本原则,各方应忠实、准确地履行已达成的和平协议,恪守各自的承诺和义务,反对无视别人的合法权利及奉行地区扩张政策。^④在1998年巴、以在美国的怀伊种植园举行谈判前,巴、以领导人均出访开罗,

¹ 参见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④ 参见蒋忠良、范洪庆、程友敏:《艰难的中东和平进程》,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年,第201—202页。

向埃及阐述自己的立场。1999年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巴拉克执政后,埃及积极支持恢复巴以和谈,一度使巴以和谈出现转机。但由于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会谈没能再次取得进展。2000年9月后,巴、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巴以和谈中止。为表示对以色列强硬政策的不满,埃及召回了驻特拉维夫的大使,总统穆巴拉克也拒绝与以色列总理沙龙会晤。

最近,巴勒斯坦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去世,阿巴斯当选为巴勒斯坦的新领导人。在巴局势急剧变化之时,埃及的一系列举动引人注目。阿拉法特去世后,埃及积极与巴、以双方沟通,最终决定在开罗为阿拉法特举行葬礼,解决了因阿翁葬礼给巴、以双方及阿拉伯世界所带来的难题。2004年11月底,埃及领导人在开罗接待了刚刚继任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的阿巴斯。为推动以色列释放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囚犯,埃及于2004年12月释放了已被定罪和关押了8年之久的以色列间谍阿扎姆。埃及推动巴以和谈的最新举动是今年2月8日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经埃及总统邀请,巴、以、埃、约四国首脑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会晤,实现了巴、以领导人4年来的首次会晤。在这次峰会上,巴以和谈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宣布正式结束已持续4年多的暴力冲突。这些成果是与埃及的努力分不开的。为给巴、以首脑会晤创造良好氛围,穆巴拉克总统在四国首脑会晤前特地与他一直不愿见面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举行了会谈。在这次峰会上,埃及同意将恢复向以色列派驻大使,以促使以色列在巴囚犯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说,穆巴拉克总统有可能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穆巴拉克1981年任埃及总统以来以色列就一直翘首以待的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埃及在巴以和谈中起到了积极的调解作用,是巴、以双方信任的“桥梁”之一。但与美国这个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主要外部力量相比,埃及的作用和地位是居第二位的。美国以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加上它与以色列形成的战略盟友关系,是唯一对以色列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也是巴、以双方都竭力争取的对象。离开美国的支持,巴以和谈将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巴、以举行峰会并达成停火协议,表面上看是由埃及运作的,但实际上是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出访中东时积极鼓动穆巴拉克的结果,这表明埃及的举动是得到美国支持的,体现着美国的意图。虽然埃及的作用与美国不可等论,但它对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方面具有美国所不能替代的影响。正如埃及前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博士所言:“虽然美国自和平进程之初即起了一种主要作用,但不能忽视埃及的核心作用。萨达特总统亲赴耶路撒冷为和平开拓新路,每当和平进程陷入僵局时,埃及总是帮助克服这些困难与障碍。”¹ 巴勒斯坦驻阿盟大使萨伊德·加马尔(Said Kamal)也认可这一点:“巴勒斯坦人信任埃及,没有它,我们将不能坐到谈判桌前。”^④ 此外,埃及还是巴、以实施已达成的和平协议的重要推动者。穆巴拉克总统多次警告以色列,称若不履行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协议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他说:“我们将不仅重回到零起点,而且状况更糟”;“如果奥斯陆协议崩塌,将加强本地区的极端主义,削弱像我一样的温和者,埃及领导人将不得不向要求远离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屈服。”^⑤ 1996年7月,在各方的压力下,内塔尼亚胡访问开罗,称遵守前政府与巴勒斯坦人达成的协议,但仍坚持“三不”政策(即不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不归还戈兰高地、不谈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针对以色列新政府的强硬立场,埃及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

¹ [埃]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第2页。

^④ Mark Huband, “Egypt’s Diplomacy Running into the Sand But it must still Press on with its Efforts to Revive Middle East Peace Talks”, in *Financial Times*, Jun. 25, 1997.

^⑤ Fawaz A. Gerges, “Egyptian-Israeli Relations Turn Sour”, in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1995, pp. 77-78.

牒,称若以色列在三周内不实施它与巴勒斯坦达成的协议,埃及将取消定于当年 11月在开罗举行的中东北非地区经济首脑会议。在埃及等国的压力下,内塔尼亚胡不得不与阿拉法特会见并握手,承诺要继续和平进程。但埃及对以色列在巴以和谈中的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只能说以色列不能完全不考虑埃及的态度。对埃及和美国的不同作用,埃及著名政治专栏作家穆罕默德·西德·阿赫迈德(Mohamed Sid Ahmed)的论断是中肯的,他说:“埃及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是鼓励巴勒斯坦人参加,而美国的作用是利用其力量影响以色列。”¹

综上所述,埃及与巴勒斯坦问题息息相关,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一直是埃及对阿拉伯政策的重要方面;埃及是巴以和谈的中间人,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方面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巴勒斯坦方面的政策受制于埃及。在 2004年 6月,埃及公开要求阿拉法特进行改革,否则将不再保证其人身安全。出于压力,阿拉法特随后不得不发表讲话,表示要推进自治政府的改革。在巴以和谈中,巴勒斯坦方面的任何重大让步都要得到开罗的默许或支持,否则将难以实行。在 2000年 7月的巴、以、美三国首脑会议上,巴、以距离达成协议只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紧要关头,埃及领导人出来发表讲话,称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的土地,任何领导人都无权放弃它。顾及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立场,阿拉法特最后放弃了达成协议的念头,巴、以失去了达成全面协议的良机。另一方面,埃及还有维持巴勒斯坦问题现状的意图(不仅仅是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有保持巴勒斯坦问题存在的意图)。巴勒斯坦问题事关整个阿拉伯民族和穆斯林的利益,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巴勒斯坦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为各个阿拉伯国家的争斗提供了舞台。就埃及而言,巴勒斯坦问题是它在阿拉伯世界发挥影响的重要领域。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存在,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及阿、以关系中的调解人角色就不会改变。因此,埃及在致力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又考虑该问题的存在对埃及有利。这一矛盾充分表现在埃及的政策上。埃及既对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但又拒绝给予居住在埃及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埃及公民资格,使巴勒斯坦人成为无国籍、无公民权的特殊群体。

Abstract Due to the close relations with Palestine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 Egyp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alestinian Issue. Starting from 1920s to 1930s, Egypt has been highlighting the Palestinian Issue in its foreign policies towards the Arab world. As a result, it has not onl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breakthrough of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but also exerted strong and direct influences on the Palestinian side. Nevertheless, on the other hand, Egypt hinders the settlement of the Palestinian Issue to a certain extent.

(陈天社, 副教授,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郑州, 450052)

(责任编辑: 吴家多)

¹ Mark Huband, "Egypt's Diplomacy Running into the Sand But it must still Press on with its Efforts to Revive Middle East Peace Talks", in *Financial Times*, Jun. 25, 1997.